

返乡潮与留守潮的叠加：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风险新变化与政策应对

张玉格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6年3月30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11日

摘要

在农民工流动格局调整与农村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返乡潮与留守潮在农村家庭内部交织叠加，推动留守老人照护风险呈现出新的变化。本文从代际支持视角出发，分析返乡潮与留守潮如何共同重塑农村家庭照护结构。研究发现，返乡并未如预期那样缓解留守老人的照护压力，反而使家庭逐步形成带有“老养老”特征的照护结构，照护压力由单一代际问题转向双代叠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推动农村照护模式由“家庭独担”转向“多元共担”，通过减轻亲代负担、分类配置照护资源、将返乡农民工纳入政策视野以及强化县域统筹和主动识别机制，提升农村照护风险应对能力。

关键词

留守潮，返乡潮，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风险，代际支持

The Intersection of Return and Left-Behind Trends: Changing Care Risks for the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and Policy Strategies

Yuge Zhang

Law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rch 30, 2026; accepted: June 2, 2026; published: June 11,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hifting labor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deepening aging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return tide and the left-behind tide intertwine and converge within rural households, driving new changes in the care risks faced by the left-behind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return tide and the left-behind tide collectively reshape the structure of rural family care. The study finds that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does not alleviate the care burden of left-behind elderly as expected; instead, it gradually fosters a care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old caring for the older”, shifting care pressure from a single-generation issue to a dual-generation burde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ural care models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family-only” to “multi-shared” responsibility.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alleviating the burdens on the older generation, allocating care resources based on differentiated needs, incorporating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into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y-level coordination alongside proactiv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s, thereby enhancing the capacity to address rural care risks.

Keywords

Left-Behind Tide, Return Tide,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Care Risk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农村家庭的代际结构与照护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农民工流动不再单纯表现为持续外出，返乡趋势日益显现；另一方面，农村老龄化不断加深，留守老人的照护压力并未减轻，反而在家庭规模缩小、照护资源收缩的背景下持续累积。返乡与留守看似分别对应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老龄化两个不同过程，但在现实中，它们逐渐在同一家庭内部交织并相互作用，推动农村家庭照护关系发生重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风险的形成条件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劳动力流动的趋势看，农民工群体正在进入新的调整阶段。截至 2025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30,115 万人，首次突破 3 亿人，比上年增长 0.5%。虽然总量仍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已明显放缓，年度增速自 2021 年的 2.4% 持续回落，到 2025 年已降至 0.5%，连续多年保持低位运行¹。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总量增速上，也体现在流动范围和群体结构上。省内流动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 61.7%，较 2020 年提高约 5 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在本省乃至县域范围内就业。与此同时，农民工平均年龄已达 43.2 岁，50 岁以上群体占比超过 30%，总规模超过 1.1 亿人²。随着年龄增长，这部分群体在城市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不断减弱，返乡不再只是个别现象，而开始成为农民工流动变化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农村老龄化及其照护压力的不断加深。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1.21 亿，占农村总人口的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³。老龄化程度在农村高于城镇的“城乡倒置”格局，意味着农村地区在养老支持、生活照料和健康服务等方面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据估算，我国农村留守老人规模约为 1600 万人。他们有的因子女长期外出而独居或少人陪伴，有的则在子女外出后继续承担孙辈照料、家务劳动等责任。无论具体情形如何，留守老人的共同处境在于，其照护需求不断增长，而家庭内部可供调动的支持资源却在持续减少。这种减少与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 2.62 人，较 2000 年的 3.44 人明显缩小⁴，传统家庭内部能够承担照护责任的人力基础正在减弱。

¹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6-03-24。

²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4/t20250430_1959523.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6-03-24。

³<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202303/P020230301403217959330.pdf>。

⁴<https://news.cctv.com/2021/05/20/ARTIIti7vXu2fCKNGMk8dbFv210520.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6-04-15。

“返乡潮”与“留守潮”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种现象，而是在农村家庭内部相互交织、彼此塑造。当返乡农民工重新回到乡村家庭生活空间，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和照护责任便开始发生新的调整。与此同时，返乡后的同住或邻近居住，又使其与父母之间的日常互动更加频繁，照护责任更容易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返乡并不必然意味着父母获得更充分的照护支持，反而可能形成“老年人照护更高龄老人”的链条，使原本集中于单一代际的照护压力逐渐转化为双代叠加的压力结构。

基于此，本文拟分析返乡潮与留守潮叠加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风险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应的政策应对路径。

2. 照护风险的新变化——基于代际支持视角的分析

返乡潮与留守潮的叠加正在重塑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结构。传统上，成年子女通过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为父母提供养老支持；但随着返乡子女与留守父母重新聚合，这一结构开始松动，变化体现在支持方向、形式、主体和认知等多个层面。

在家庭照护与代际关系领域，国外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脉络，代际团结理论(Bengtson & Roberts, 1991) [1]从情感、功能、结构等多维度测量代际支持强度，而代际矛盾理论(Luscher & Pillemer, 1998) [2]则揭示了代际关系中团结与冲突并存的复杂性，并强调家庭照护不仅是资源流动问题，更受文化规范与代际期待的深刻影响。国内研究则更聚焦于人口流动与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方鸣、余娟清(2025)将代际支持操作化为五个维度，实证发现返乡背景下亲代家务支持显著而子代照护支持不足[3]；谷玉良(2018)通过三种流动模式的分析揭示了留守老人照护缺失与牺牲精神的矛盾[4]；刘二鹏等(2022)从县域统筹视角提出了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5]；张玮、穆怀中(2025)则从生存公平角度指出农村养老金水平过低带来的经济保障风险[6]。总体而言，国外理论为分析代际关系提供了系统工具，国内研究则积累了丰富的实证发现，但既有文献多将“返乡”与“留守”分开讨论，对二者叠加后的照护风险变化及逆向代际支持机制关注不足，这正是本文试图推进的方向。

本文借助“代际团结-代际矛盾”这一理论透镜，分析返乡潮与留守潮叠加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结构的重塑过程，以及照护风险如何由此生成与延迟。

(一) 代际支持方向的转变：从子代赡养亲代到亲代帮扶子代

传统家庭养老建立在“子代赡养亲代”的逻辑之上，子女外出务工后通过经济汇款和返乡探望为父母提供支持，返乡潮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在不少返乡家庭中，子女回乡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稳定的经济基础，反而常常面临创业起步、就业转换和收入重建等压力。为维持家庭生计，父母重新成为重要的支持提供者，通过承担孙辈照料、家务劳动和部分农业生产，为子女腾挪就业和经营空间[3]。

谷玉良(2018)在鲁西南农村的深度访谈中，一位65岁的留守老人道出了许多农村父母的心声：“有哪个做老的不希望子女生活更进一步、更好呢……我们这个年龄了不能给他们做更多的贡献，照看家庭和孩子这也算是力所能及的事……压力肯定是有，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也有点力不从心，那有什么办法呢。”(受访者 ML20170803)。这段访谈生动地揭示了留守老人“牺牲精神”的内在逻辑：将支持子女视为父母的责任，即便这意味着透支自己的体力和健康。在这一逻辑下，留守父母从“被照护者”转变为事实上的“照护者”[4]。

由此，“亲代帮扶子代”逐渐取代“子代赡养亲代”，成为一些返乡农民工家庭中的现实图景。问题在于，父母并未因子女返乡而自然获得更多照护资源，反而在家庭重新整合中承担起新的责任。他们从被赡养者转变为家庭运转的重要支撑，自身养老需求则不断被后置。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机能下降，前期付出的时间、劳动和经济成本，实际上正在持续透支其晚年生活的保障能力。表面上看，返乡强化了家庭联系；但从支持结构看，这种联系未必意味着老人处境改善，反而可能意味着其照护负担进一步加重。

(二) 代际支持形式的分化：居住安排差异下的照护互动

返乡背景下，代际支持的具体形式也在发生分化，而这种分化与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密切相关。返乡子女与父母是共同生活还是分开居住，直接影响代际互动的内容和频率，并塑造出不同形态的照护风险。

在同住家庭中，空间上的接近使父母更频繁地参与孙辈照料、家务分担和生活辅助，家庭内部支持呈现出高频、嵌入式特征。“亲代帮扶子代”也因此更容易稳定下来，并成为习以为常的家庭分工。然而，正因为这种支持过于日常化，父母自身的照护需求往往被持续付出的角色所掩盖。当其身体状况恶化时，子女可能因忙于创业、务工或维持生计而难以及时回应。

在分住家庭中，返乡子女与父母虽同处乡村社会空间，却未必形成高频的日常照护关系。空间距离削弱了面对面照料的可能，代际支持更多体现为经济补充或阶段性帮扶。父母或许能够获得一定物质支持，但在就医、陪伴和生活照料方面仍面临明显不足。对于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而言，经济支持并不能替代日常照护。

因此，无论同住还是分住，返乡都不自动转化为对老年父母更充分的照护支持。差别只在于，照护风险在不同居住安排中呈现出不同形态：同住家庭中，老人的需求更容易在持续付出中被遮蔽；分住家庭中，生活照料则更容易因空间阻隔而发生缺位。两种模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即老年父母在关键照护资源上仍处于相对匮乏状态。

(三) 代际支持主体的老化：返乡农民工的照护脆弱性

返乡潮对农村家庭照护格局产生更深层影响，还在于返乡者本身并不总是传统意义上的年轻劳动力。随着农民工整体年龄上升，返乡农民工中已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中老年阶段，他们在家庭中虽然仍承担支持责任，但自身也逐渐成为潜在的照护需求者。

这种主体老化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许多返乡农民工离开城市后，由相对较高的务工收入转向县域或乡村内部就业，收入水平往往出现下降，而此前又未必积累了充分的养老储备。现有农村养老金水平有限，难以弥补返乡后的收入断裂。随着年龄继续增长，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转换，更是养老保障不足的问题逐步显化[7]。

主体老化同样体现在健康层面。长期高强度体力劳动使不少返乡农民工较早积累了慢性病、职业损伤和身体劳损等问题。返乡之后，这些健康风险并不会消失，反而可能随年龄增长进一步加重。于是，在家庭内部，他们一方面需要照料更高龄的父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自身身体衰退所带来的照护需求。照护关系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出相互牵连、彼此挤压的状态。

正因如此，农村家庭中的照护压力开始突破“留守老人”这一单一对象，向返乡农民工及其父母两代人共同扩展。返乡者既要回应父母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又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养老提前做准备。当有限的家庭资源同时面对两代人的养老和照护问题时，原本尚可维持的支持网络便会变得脆弱，照护风险由此表现为家庭内部的双代承压。

(四) 代际支持认知的遮蔽：需求延迟显现的形成逻辑

代际支持结构的变化，不仅受经济资源和居住安排影响，也深受家庭文化观念和代际认知方式的制约。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往往并不被理解为简单交换，而更多被赋予责任、伦理和情感上的正当性。留守老人普遍存在较强的“牺牲精神”，即使承担孙辈照料、家务劳动和额外付出，也往往将其视为父母应尽的责任[4]。

这种认知既与传统孝道文化中的角色期待有关，也与农村家庭对子代发展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许多老人相信，只要当下尽力支持子女，未来便可能获得某种形式的回报。同时，熟人社会中的舆论压力也强化了这种倾向，使老人更倾向于压抑自身需求，将自己长期置于支持者的位置，而不是主动表达作

为受照护者的合理诉求。

问题在于，这种看似维系家庭运转的牺牲精神，实际上遮蔽了照护风险的真实积累过程。由于老人不断延后自身需求，身体衰退、情感孤立和生活照料不足等问题往往难以及时被识别。等到这些需求集中显现时，老人通常已进入高龄阶段，而子女也可能同时面临年龄增长、收入不稳和照护负担加重等问题，难以兑现此前隐含在家庭关系中的“未来回报”。这样一来，照护风险便呈现出延迟爆发的特征：它在较长时期内被家庭内部的道德逻辑所掩盖，却在某一阶段集中转化为难以承受的现实压力。

总体来看，返乡潮与留守潮的叠加，并未简单修复农村家庭的照护功能，反而在代际支持结构调整中推动了亲代负担加重、照护形式分化、双代压力扩展和需求延迟显现等新变化。照护风险因此不再只是留守老人个体的生活困境，而是嵌入家庭代际关系重组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

3. 政策应对——从家庭独担走向多元共担

返乡潮与留守潮的叠加，并未如一般预期那样缓解农村家庭的照护压力，反而在代际支持结构重塑的过程中，使照护风险以新的方式生成、积累并延迟显现。无论是支持方向的变化、支持形式的分化，还是支持主体的老化与支持认知的遮蔽，都表明农村家庭原有的照护均衡正在被打破，而主要依赖家庭内部消化风险的传统模式，已越来越难以承载不断加重的照护负担。因此，政策回应不能停留于对个别困难群体的事后补救，而应转向对家庭照护压力的整体分担，在尊重家庭养老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支持体系，使家庭不再独自承担本应由公共制度分担的风险。

（一）减轻亲代负担：将“隐形照护者”纳入政策视野

在代际支持方向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政策首先需要回应的是老年父母由“被赡养者”转为“支持提供者”的现实处境。返乡子女在重新进入乡村家庭后，常常面临创业、就业和收入重建等压力，而留守父母则通过承担孙辈照料、家务劳动和农业辅助等责任，为子女减轻生计负担。问题在于，这些父母虽在事实上承担着重要的照护和支持功能，却很少被视为需要支持的对象。

要缓解这一结构性问题，关键是让家庭中的“隐形照护者”真正进入政策视野。现有农村养老政策更多聚焦于高龄、失能老人，对于长期承担家庭内部照护劳动的老年人关注不足。未来应将照护者支持纳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必要的喘息服务、适度补贴和心理支持，以减轻其现实负担，并承认其付出的社会价值。

在返乡农民工家庭中，祖辈承担孙辈照料往往是最集中的负担。若长期依赖家庭内部调节，这部分责任很容易持续压在老年父母身上。因此，发展普惠性的社区托幼和课后托管服务，是减轻亲代负担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也应拓展互助养老的服务对象，将那些持续为子代承担家务支持和照护责任的老人纳入支持范围，通过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形式，分担其日常压力。

（二）分类施策：围绕居住安排差异配置照护资源

返乡背景下，代际支持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展开的。返乡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安排不同，决定了代际互动的具体形式，也使照护风险呈现出不同形态^[8]。如果忽视这种差异，而以统一方式配置资源，政策效果往往会受到限制。

对于同住家庭而言，老人与返乡子女处于持续而紧密的共同生活状态，家庭内部更容易形成“父母持续付出、子女专注生计”的格局。对这类家庭，政策重点不在于单纯增加经济补贴，而在于把专业化服务延伸到家庭内部，使老人在承担日常照护责任的同时获得外部支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上门照料、助餐助洁和日间照护等服务，都可以在这一层面发挥作用，“家庭养老床位”等制度也应在农村地区加快落地。

对于分住家庭而言，更突出的矛盾则是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之间的断裂。返乡子女虽然可能在经济

上给予父母一定帮助，但并不共同居住，面对面的日常照护难以持续实现。高龄、体弱或失能老人真正迫切需要的，往往不是经济补偿本身，而是照料服务的可及性。因此，应依托县域养老服务网络，将专业照护资源更有效地送达分散居住的老人家中。

要实现真正的分类施策，还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家庭照护形态监测机制，动态识别哪些家庭属于同住支持型，哪些家庭属于分住补偿型，并据此配置差异化资源。只有在识别准确的基础上，有限的公共资源才能实现更有效利用。

（三）扩展政策视野：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养老与照护体系

在返乡潮与留守潮叠加的背景下，照护问题已经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留守老人需要帮助”的单一议题。随着返乡农民工群体年龄不断上升，他们本身也逐渐成为潜在甚至现实的照护需求者。若政策仍停留于传统“留守老人”视角，便难以回应农村家庭中日益明显的双代承压问题。

因此，有必要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养老与照护政策视野。首先，应回应其养老储备不足的问题。许多返乡者在离开城市后收入明显下降，而此前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和养老储备又较为有限。可探索针对中高年龄返乡农民工的养老储备支持机制，通过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适度倾斜等方式，对其未来养老能力进行前置性支持。

其次，需要进一步打通城乡养老保障的衔接通道。现实中，不少返乡者在城市参加过职工养老保险，但返乡后在转移接续、缴费延续和待遇衔接方面仍面临困难，容易陷入“断保”或“漏保”状态。简化跨地区转移接续流程，保障既有权益不因返乡而受损，是将其真正纳入政策体系的关键。

此外，还应强化对双代照护家庭的制度支持。当前一些返乡家庭同时面临父母高龄失能与返乡者自身衰老的问题，家庭照护资源被显著稀释。在这种情况下，应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和扩面过程中，更多关注农村双代照护家庭的特殊处境，将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优先纳入保障范围，以减轻长期照料负担。

（四）县域统筹：提升照护风险的主动识别与支持能力

照护风险之所以容易在农村家庭内部长期积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很多老年人的需求不会被及时表达出来。受牺牲伦理、家庭责任观和熟人社会评价压力影响，不少老人倾向于压抑自身在生活照料、健康照护和情感支持方面的需要。政策回应因此不能停留在被动受理层面，而必须转向更积极的主动识别。

在这一过程中，县域统筹应成为政策落地的关键抓手。县域既是连接宏观政策与基层执行的重要层级，也是整合养老、医疗、救助和基层治理资源的现实平台。依托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可以更早识别和回应潜在照护风险。具体而言，应通过定期走访、健康筛查、邻里观察和村居反馈等方式，建立农村老年人照护需求的常态化评估机制，尽早掌握老年人的功能状态、家庭负担与照护需求^[5]。

与此同时，政策还应提升对“牺牲精神”这一家庭文化现象的敏感度。那些长期承担孙辈照料、家务劳动和额外家庭责任的老人，往往正是需求被遮蔽最深的高风险群体。今后的需求评估和风险筛查，不应只关注老人是否高龄、失能或独居，也应将其是否承担额外家庭责任纳入分析指标。

此外，减少需求遮蔽，还离不开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发展老年协会、互助组织和志愿服务网络，不仅能够为老人提供现实帮助，也有助于形成更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其能够在家庭之外表达需求、获得理解，从而提高照护问题被看见、被回应的可能性。

总体来看，返乡潮与留守潮叠加背景下的农村照护问题，已经不能继续依赖家庭内部自行消化。只有在尊重家庭养老传统的基础上，将照护责任逐步纳入政府、社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支持体系，才能缓解家庭内部的代际失衡，并提升农村照护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返乡潮与留守潮叠加的现实背景，围绕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风险的新变化及其政策应对展

开分析。研究发现,返乡潮与留守潮的并行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农村家庭原有的照护结构。农民工总量增长放缓、省内流动比例上升以及返乡趋势增强,与农村老龄化持续加深、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相互交织,使返乡农民工与留守父母在家庭内部重新聚合,并由此形成了带有“老养老”特征的家庭照护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照护压力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子女外出-父母留守”式单向缺位,而是逐步由单一代际问题转向双代叠加的压力格局,照护风险也因此不再仅仅集中于留守老人,而是开始在返乡农民工与其父母之间呈现代际连锁扩散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风险在返乡潮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方面,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发生了逆向转移,留守父母并未因子女返乡而自然获得更多照护,反而在许多情形下继续承担孙辈照料、家务劳动乃至农业辅助等责任,成为事实上的家庭支持者。另一方面,代际支持形式又随着居住安排的不同而发生分化:在同住情境中,老人的照护需求更容易在持续付出中被遮蔽;在分住情境中,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之间则更容易发生断裂。与此同时,返乡农民工自身也在不断老化,他们在收入、健康和养老储备等方面面临多重压力,使农村家庭中的照护问题逐渐由“留守老人需要照护”扩展为“两代人共同承压”的结构性困境。更值得注意的是,留守老人长期受牺牲精神和家庭责任伦理影响,往往倾向于将自身需求置于子女发展之后,这使照护风险并不总是即时显现,而更常以延迟和潜伏的方式在家庭内部积累。

由此可见,返乡潮与留守潮的叠加并未如通常想象那样自然修复农村家庭的照护功能,反而在家庭照护结构重组的过程中,使照护责任向亲代逆向转移、向双代蔓延,并推动风险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生成和累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问题已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人口外流背景下的单一养老问题,而应被置于代际支持关系变化与家庭照护秩序重组的过程中加以理解。

参考文献

- [1] Bengtson, V.L. and Roberts, R.E.L.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856-870. <https://doi.org/10.2307/352993>
- [2] Luescher, K. and Pillemer, K. (1998)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413-425. <https://doi.org/10.2307/353858>
- [3] 方鸣,余娟清. 代际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5, 49(3): 131-141.
- [4] 谷玉良.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1): 114-122.
- [5] 刘二鹏,韩天阔,乐章. 县域统筹视角下农村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7): 133-142.
- [6] 张玮,穆怀申.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风险与制度完善[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3(5): 69-78.
- [7] 江维国,刘雅喆. AI 赋能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机理、障碍与政策应对[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3(1): 137-145.
- [8] 陆杰华,程美涵.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探究[J]. 社会政策研究, 2025(4): 14-23, 132.